

## 衰世中的魯國柱石——冉有新論

劉國平\*

（收稿日期：103年3月31日；接收刊登日期：103年9月28日）

### 提要

冉有雖列四科十哲之一，又多才多藝，但受到孔子的責備也最多，甚至因為幫季氏搜括，使孔子讓同門聲討他。本文認為單從《論語》未能突顯冉有該有的歷史評價與定位，因此將其人置於當時的之歷史中去考察，結果發現，冉有不獨有行政的才能，在戰略與戰術的上的表現，也十分出色。在亂世中，他留在體製內改革，擋掉季氏許多無理的施政，表現出鄂鄂爭臣的正直，處衰世而能有所作為，不僅戰勝入侵的齊國，使國君迎回孔子，在子路離開後，更是孤軍奮戰，維持國內政局穩定，調和魯君與季氏之衝突，其先為季氏之「聚斂附益」，亦有特殊之原因。此外，在孔子卒後至魯哀公二十七年之十餘年間，魯國無事，君臣相安，當亦與冉子之在位施政有關。實堪稱「衰世中的魯國柱石」。

關鍵詞：冉有、政治才能、魯國、季氏、國之柱石

---

\*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古代文獻中，都沒有對冉有的出身有所介紹，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sup>1</sup>

案孔子生於公元前 551 年，如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則冉有當出生於公元前 522 年，卒年不詳。鄭玄說他是魯國人，<sup>2</sup>應該可信。又據《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冉有為「仲弓之宗族」。<sup>3</sup>而《論語·雍也》載：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sup>4</sup>

犁牛為耕牛，周朝之時，耕牛不作犧牲，意謂仲弓之父，出身不佳；騂是赤色，角指牛角周正，合用作犧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可能別有所本或據此而謂：「仲弓父賤人」。<sup>5</sup>《孔子家語》則直謂仲弓父不肖。<sup>6</sup>如果仲弓是「賤人」出身，而冉有為仲弓之宗族又同年，則冉有之出身，可能不會高到哪裡去。

冉有在魯，從學於孔子，也是孔子極親近的弟子之一，孔子為中都宰，進而為司空、司寇，最後為大司寇，攝行相事的日子中，冉有必曾協助孔子，故子華使於齊，冉有得為其母請粟。且《荀子·宥坐》亦載：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sup>7</sup>

<sup>1</sup> 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第三冊（臺北市：鼎文書局，1991年），頁2190。

<sup>2</sup> 《史記集解》引鄭玄曰：魯人。同前註，頁2190。

<sup>3</sup> 晉·王肅注：《孔子家語》（臺北：世界書局，1966年，家語等五十七種），頁87。案王肅注《孔子家語》一書，前人多以其為偽書。但自河南信陽長台關楚簡、定州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阜陽雙古堆漢墓簡牘》、《上海博物館藏竹書》等新材料陸續發現與公布後，學者多認為王本的大部分內容尚保持著原本的樣貌。李學勤〈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的研究論文摘要亦指出：「王肅自序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孫孔猛，當為可信；又有源自孔安國的傳說；這與漢魏時期的孔氏家學有關」（《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1987年6月），頁60。其它相關研究不少，茲不贅，要之，知《孔子家語》之內容可信，足矣。

<sup>4</sup>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頁85。

<sup>5</sup> 同註1，頁2190。

<sup>6</sup> 同註3，頁87。

<sup>7</sup> 李滌生：《荀子集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642。

季孫不悅孔子之語，冉有得聞，則冉有不獨協助孔子，且已仕於季氏，並與季氏有一定之契合度，乃至頗有政績可知，此亦孔子流浪列國之時，季康子所召孔門高弟唯冉有的主要原因。<sup>8</sup>在孔子被迫離開魯國往衛的途中，冉有亦嘗為孔子駕車，師弟如話家常。<sup>9</sup>其後魯國召回冉有，郎之戰，冉有打敗入侵的齊國，聲名大噪，地位益加鞏固，在他的建議下，魯國終於迎回孔子，其後冉子長期在魯國為季氏之家臣，算是從政之路居於最高權位的弟子之一。<sup>10</sup>而在為季氏宰之同時，他也受到孔子最嚴厲、次數最多的責備。朱熹也說他「不能立志」，又說他「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sup>11</sup>所幸，《論語·先進》在記載了孔子的一句「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之後，接敘了：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sup>12</sup>

此即所謂的四科十哲。冉有既名列四科十哲的政事之科，可知其在政事方面有十分傑出的才能。

然而，這樣的一個人才，其行政藝能既受孔子的高度肯定，同時也飽受孔子的嚴責。但郎之戰又見冉有無懼無悔之勇略，到底冉有是一個怎樣的人，孔子之責備是否過於求全？都是值得探討的。而檢索有關冉有的研究論文，海峽兩岸極大多數皆為《論語·侍坐章》的析論，與本文關係不大。舒大清〈孔子弟子冉有論〉，則以「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夫子」，而責冉有「奴性十足」。<sup>13</sup>日人諸橋轍次的〈論語弟子考—冉有〉只有兩頁。<sup>14</sup>王漢蘇的〈孔門十哲生平述要〉，亦僅略述冉有生平。<sup>15</sup>專書方面，修建軍《孔門弟子》介述冉有者，僅〈冉有與孔子歸魯〉及〈冉有與孔子思想的差距〉二目。<sup>16</sup>高專誠《孔子·孔子弟子》一書對冉有的介紹亦僅〈冉有的政治成就及其與孔學的分歧〉一節。<sup>17</sup>朱守亮

<sup>8</sup> 季康子召冉有，子貢以為魯召冉有將大用之，見同註1，頁1927。

<sup>9</sup> 《論語·子路》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見同註4，頁143。

<sup>10</sup> 子夏雖為魏文侯師，然未必有實際行政之權力。

<sup>11</sup> 朱子云：「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見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18卷〈訓門人〉六，頁2846。

<sup>12</sup> 同註4，頁123。

<sup>13</sup> 舒大清：〈孔子弟子冉有論〉，《湖北社會科學》第5期（2006年5月），頁113-115。

<sup>14</sup> 諸橋轍次著，千祥譯述：〈論語弟子考（11）--冉有〉，《孔孟月刊》第2卷第11期（1964年7月），頁24+9。

<sup>15</sup> 王漢蘇：〈孔門十哲生平述要〉，《育達學報》第2卷（1988年12月），頁40-49。

<sup>16</sup> 修建軍：《孔門弟子》（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頁74-80。

<sup>17</sup> 高專誠：《孔子·孔子弟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59-168（中含插圖2頁）。

的《論語中之四科十子》，僅就《論語》所錄言行介述冉有；<sup>18</sup>傅佩榮《孔門十弟子》為一般性的論述，其第五章〈向冉有學習做官〉涉及冉有，<sup>19</sup>但認為冉有「內向懦弱」，做得「不好」。蔡仁厚《孔門弟子志行考述》講冉有之資性、才藝、政治與義勇，較為全面，亦有深入處，但較多的還是一般性的介述。<sup>20</sup>而綜觀諸家之論，多未能深入考慮冉有之施政背景，對於重要文獻多釋其辭而未釋其所以辭，敘事亦多不依事理先後，因此本文回到魯國歷史，先探討冉有之質性風姿與冉有之藝能學問，這是冉有成為國之柱石的條件。其次論冉有行政之難能與護國之勇略，以說明他如何撐持魯國與護守魯國。最後綜合結論，以給冉有一個適當的評價。

至於本文所涉及之資料如《孔子家語》、《韓非子》、《韓詩外傳》等，是否皆可引據作為論證之資，則於第一次引用時於註腳中加以討論。

## 二、冉有之質性風姿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既對冉有無多述，故只得就典籍之蛛絲馬跡分析其質性風姿。

### （一）冉有之謙退與謹慎

冉有質性謙退謹慎，《論語·先進》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sup>21</sup>

孔子問完問題後，子路最先回答，其言直截而俐落，及義而無隱；無絲毫之退縮，有承擔之氣勇。子路答畢，按年齒曾皙當答，但曾皙兀自在那邊彈琴。曾皙既不答，故冉有乃待

<sup>18</sup> 朱守亮：《論語中之四科十子》（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頁141-162。

<sup>19</sup> 傅佩榮：《孔門十弟子》（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年），頁107-123。

<sup>20</sup> 蔡仁厚：《孔門弟子志行考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56。

<sup>21</sup> 同註4，頁129-131。

孔子問及而回答，這就是他的謹慎處。但冉有的回答孔子，纔講了一句「方六七十」，又退縮成「如五六十」；纔講了句「可使足民」，又立即補上一句「如其禮樂，以俟君子。」顯見冉有遇事謹慎，謙退保守，務實而不浮誇之性格。孔子既深知冉有之性格，故有針對性之教導。《論語·先進》載：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sup>22</sup>

子路個性剛強，信心滿滿，屬行動派人物（故曰兼人），只思考浮面的對錯，不深思背後的事理，行事易生差池，如孔子論正名，子路即云：「子之迂也，奚其正？」「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sup>23</sup>等事都缺乏深層之思考。而冉有明知事理確對，但常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擺盪，因此瞻前顧後，較顯優柔寡斷。但冉有一旦評估，認為現實更為重要，而無大損理想時，他其實亦有獨立負責之精神，例如他為公西華請粟一事，就違逆孔子之意，怎可說他凡事必告孔子，奴性十足？而就算有些對的事他不能堅持到底，但畢竟受孔子教誨，行事也總還有一定的原則與底線。<sup>24</sup>

## （二）冉有之聰慧與善待人

魯哀公二年(493B.C.)，衛靈公卒。其後衛君父子爭位，《論語·學而》載：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sup>25</sup>

<sup>22</sup> 同註4，頁128。

<sup>23</sup>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721。案韓非敘春秋事，多本《左傳》，且《說苑·臣術》及《孔子家語·致思》亦載此事，故雖為法家之書，此事大抵可信。且《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稱「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既云「觀往者得失之變」，則其事多實可知。本傳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則韓非之著書，當在入秦之前可知。至少《史記》提到的這十餘萬言，包括〈內外儲〉等，並非後人新摻入者，是可以肯定的。

<sup>24</sup> 如《論語·先進》，孔子就說：冉有「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同註4，頁129。

<sup>25</sup> 同註4，頁96。

這句話的重點雖是在講「孔子既推崇伯夷、叔齊之讓，故必厭惡衛國父子之爭，以是知夫子之不為衛君。」<sup>26</sup>其問諸子貢，可知冉有有自知之明，知曉自己不如子貢，子貢之智愈於自己，此其一。但冉有亦知此事不好直問老師是否助衛君，而子貢卻可能獲得答案，此其二。冉有既知道自己不如子貢，而能問之子貢，則見冉有不嫌示短於子貢，亦不以問人為恥，此其三。子貢既願為之轉問老師，亦願從旁敲側擊中得到老師的回答後，轉譯之、解讀之，此見冉有與同儕相處之和諧，故朋友樂為解惑，當然亦見子貢「聞一以知二」之智，此其四。然更重要的是此語顯示冉有畢竟有分判是非之心，對於孔子是否會幫助衛國國君，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該如何選擇，心中存疑，故有此問，而由此亦見其「好學」、「好政」之一端，此其五。進而言之，冉有不自己問孔子「為衛君乎？」而問諸子貢，此即顯現其「退讓謹慎」的性格，此其六。《論語·先進》：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改為標楷體）

「行行」是剛強貌，子路剛強，能抗壓禦侮，而不為妥協，故孔子戒以「不得其死」。而「侃侃」是和樂貌，能與人為善，斟酌理想與現實，故能周旋事理，平衡利義，此見冉有與子貢的氣類相近，「不知其人觀其友」，亦於此可以見之。

此外，冉子在同儕心目中，也是一位向仁之人，《論語·公冶長》：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sup>27</sup>

儘管子路沒有被孔子以仁稱許過，但子路曾問管仲非仁者與？可見子路也極重視此問題，他對母親的孝心也說明他的仁，在魯國起長溝之繇役中，子路主動提供食物，亦是其仁心的表現，故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而其次問「求也何如」、「赤也何如」？通常被相提並論者，其輕重、分量亦多相當，可見此三人在孟武伯的心目中，也都具有很高的德行。或許孟武伯視三人過高，但至少有一定程度之真實性，否則其問題豈非唐突？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感慨萬千的說：「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

<sup>26</sup> 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34。

<sup>27</sup> 同註4，頁77。

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之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sup>28</sup>子貢因為經濟能力極好，孔子在錢財用度上不少來自子貢的給付，此見子貢對老師的尊愛。《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亦載，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哭過後，讓子張往衛國弔唁。子張還沒到，而冉有恰巧正在衛國，因此他「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意思是冉有準備了一束帛、四匹馬，假裝是奉孔子的名義去弔唁，想為老師做好人。雖然孔子聽到後說了句「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sup>29</sup>但其愛護老師的心意，亦與子貢相近，只是沒有子貢那樣的財力罷了。

冉有的愛人之心，從以下的一件小事也可看出。《論語·雍也》載：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sup>30</sup>

子華家裡富有，但子華既使於齊，該得的，冉有為之申請，是為朋友著想，孔子答應增給了兩次，冉有以朋友之義，又私助五秉，雖不合孔子「君子周急不繼富」之時中理念，<sup>31</sup>及救急之想法，然亦可見其對待朋友之寬厚。

### 三、冉有之藝能學問

《論語·憲問》載：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孟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sup>32</sup>

<sup>28</sup> 同註1，頁3258

<sup>29</sup> 同註3，頁108。

<sup>30</sup> 同註4，頁85。

<sup>31</sup> 《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離婁》下云：「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知冉子之過與，是傷惠的。同註4，頁296。

<sup>32</sup> 同註4，頁151。

孔子所稱冉有之藝，文獻並未明指，而古代藝字的意涵有四：其一指種植作物，<sup>33</sup>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謂：「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sup>34</sup>」但從孔子「我不如老農」、「我不如老圃」之言，可知孔子所指冉有之藝，並非指此。

其二是與道連用的「道藝」。《周禮·地官》就曾提到「道藝」二字，<sup>35</sup>指的是管理、教育人民之的技巧、方法、能力，也就是「政治才能」的意思。本節以孔子美冉有之藝，而冉有之藝最重要的就表現於他的政治才能，故以藝能為標題。但此「藝能」二字所包，又不僅道藝而已。

其三，是指具體可操作性的技術、亦即《說文》所稱之「技藝」。<sup>36</sup>《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有所謂的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sup>37</sup>文中分別六種特殊之專業技能十分了然。冉有既能領軍抗齊，亦當兼具射、御等多種技藝或才能。

其四指博學多識。《論語·子罕》載：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sup>38</sup>

此處藝能二字雖分猶合，至少編撰《論語》之人的認知如是，所以才將子罕之言與子貢之於牽合於一章或前後並列。至於孔子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云云，蓋自謙之辭。吳太宰既以孔子之多能，讚其聖者，此多能之「鄙事」為何？觀《列子·仲尼》載太宰見孔子云：「某聖者歟？」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sup>39</sup>可知一般人以孔子博學多識為能，<sup>40</sup>而能者，藝也，故冉有亦當為一博學多識之士。

<sup>33</sup> 《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所謂：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樹「藝」即是樹「藝」）。見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周禮注疏》（李學勤主編標點本《十三經注疏》重刊宋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13。

<sup>34</sup> 同註4，頁259。

<sup>35</sup> 《周禮·地官·司徒·鄉大夫》云：「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同註33，頁348。

<sup>36</sup> 《說文》女部云，「姑：小弱也，从女占聲。一曰女輕薄善走也，讀若占。一曰多技藝也。」技藝，就是技能的意思。見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頁625。

<sup>37</sup> 同註33，頁314。

<sup>38</sup> 同註4，頁110。

<sup>39</sup>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20。案《列子》雖雜采諸書，然此說與《論語》、《史記》等皆相合，當可據信。

<sup>40</sup> 《史記·孔子世家》亦多載孔子博學多識之能，如「楛矢所從來」等，但孔子不自以此為能。

而由《論語·先進》〈侍坐章〉冉有答孔子問志時，曾自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可知其長於理民，而理民與稅賦關係密切，亦與書數有涉，所以孔子所說冉有之藝，當包括管理百姓的「行政能力」、六藝中射、御、書、數，及博學多識等才能。至於禮樂，則其自言「以俟君子」，孔子也認為他仍須「文之以禮樂」方才為成人，是知禮樂非其長項，但亦非絕無聞涉，此觀後文《家語》〈曲禮·子貢問〉及〈五刑解〉載冉有之問可知。

《韓詩外傳》卷八載，魯哀公曾經問冉有說：「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回答說：「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魯哀公又問：「何以知其然也？」冉有就舉子路、子貢等，「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sup>41</sup>又說：

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祧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也，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輓車，見秦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婿，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喜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sup>42</sup>

以上祧賈、百里奚、太公望、管仲四人之出身，行事、成就，他能隨舉回應，並能引《詩》相發明，可見冉有的「好學」與「多識」。也能看出他與哀公也有不錯的互動。而這也因為他半輩子，進則為季氏之宰，理其官職，退則為孔子弟子，受教聖師，勤勉向學的緣故。不僅如此，冉有亦頗「好問」，「夫子為衛君乎？」固是一例。孔子適衛，冉有駕車。子曰：「庶矣哉！」他也問：「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他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sup>43</sup>此處即顯現其對治國為政相關問題的關懷。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亦載：

<sup>41</sup> 許維通：《韓詩外傳集釋》（臺北：中華書局，1980年），頁295。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雖稱其書「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故稱外傳…班固論三家之詩，稱其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但只是與經義不相比附，非其本義而已，並不是說這些古事古語非是事實。且所舉哀公、冉有、子路、子貢等皆史有其人其事，《提要》亦言其「精理名言，往往而有」，所述之事，亦於理無乖，當可採信。

<sup>42</sup> 同前註，頁295-296。案：本段所舉百里奚、太公望、管仲等亦皆史有其人其事，祧賈當亦有其人。

<sup>43</sup> 同註4，頁143。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為之哉？」<sup>44</sup>

案桓魋之自為石槨，孔子只就其奢靡批判，故而冉有有「禮，凶事不豫」之質疑。這理可以看出冉有對禮並非完全無知，也重視事情之合禮與否。而孔子隨後的解釋，就證實了冉有的認知無誤，只是孔子更重視的是「工匠皆病」，故直接批判了桓魋的奢靡。

《孔子家語·五刑解》亦載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又問：「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詳為回答後，冉有跪（當作蹶）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而且「退而記之」。<sup>45</sup>這些「問題」都很重要，也都與「禮」有關，也可看出他的好學深思。

冉有的「口才」也不差，哀公二十三年(472B.C.)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左傳》記載了冉有的說詞：

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sup>46</sup>

《孔子家語·儒行解》更記載孔子在衛，冉有說服季康子讓孔子回魯的說詞：

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己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延之。<sup>47</sup>

「卻步而欲求前人」的比喻，既生動又有創意，整體的說詞亦簡潔有力，季孫就是用了這套說詞告訴哀公，孔子才能風光的回到魯國。<sup>48</sup>

除了以上的敘述，我們亦可從相關的事例推知冉有藝能到達何種「境地」。《韓詩外傳》卷十載卞莊子好勇，但母親在時，他三戰三北，國君朋友都不諒解，母死之後他說：

<sup>44</sup> 同註3，頁104。

<sup>45</sup> 同註3，頁70。

<sup>46</sup> 清·阮元校刊《十三經注疏·左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刊記），頁1049。

<sup>47</sup> 同註3，頁7。

<sup>48</sup> 同註3，頁7。《孔子家語·儒行解》云：「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

「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sup>49</sup>可見卞莊子之勇，非匹夫之勇，他考慮到要奉養母親，故不敢以身殉國，而寧可接受敗北辱身，及母親辭世，三年喪畢，乃敢不惜一身，展現其好勇之本色，繼之以死，此見其處理「勇」這個理念之難能。《史記·張儀列傳》亦載陳軫言卞莊子欲刺虎事。<sup>50</sup>《荀子·大略》篇更謂：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sup>51</sup>而孔子將卞莊子之勇與冉有之藝相提並論，因此我們可以略知冉有之藝，絕非常人之所能可知。而卞莊子之處勇，是極為深思熟慮，謀定而動，此點正孔子所稱，而亦與冉有之質性略同。

再從「孟公綽之不欲」來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sup>52</sup>

孟公綽能受到孔子對他的敬待，可想而知其在德行方面的某種堅持。而冉有之藝與之相提並論，其藝如何亦可思過半了。

#### 四、冉有行政之難能

冉有雖亦有是非之心，理民之志，但對於現實有時亦稍顯無能為力，《論語·八佾》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sup>53</sup>

<sup>49</sup> 《韓詩外傳集釋》載：「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同註41，頁352-353。

<sup>50</sup> 陳軫云：「(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鬥鬥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鬥，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見同註1，頁2302。

<sup>51</sup> 同註7，頁622。

<sup>52</sup> 同註1，頁2186。

<sup>53</sup> 同註4，頁62。

當時的魯國，季氏專政，<sup>54</sup>人所共知，凡魯國國君當行的典禮，季氏大概不必請示就直接辦了，季氏是否自覺「旅泰山」是一種僭越的行為，還是視為「理所當然、無庸置疑」之事，不得而知，但看在孔子眼中，則「分明」是僭越的大事。不過，形勢比人強，冉有確實無力阻檔此事，因為想要匡正，除非「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公然後可」，<sup>55</sup>要不然就只有去職一途。前者既非冉有之力所能為，後者恐亦無濟於事。因此在冉有告訴孔子之後，孔子也就沒有再責備冉有，而只有兀自嘆惜，由此可知，孔子也明白現實之難為。何況孔子之問「女弗能救與」，即已顯示，此事非冉有之主意，且冉有是站在反對的立場的。季氏之旅於泰山既成事實，多言亦屬無益。孔子向來主張「臨事而懼，好謀以成」，「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對此既非冉有個人之失德且木已成舟之事，自然沒有深責之必要。

冉有在從政的生涯，至少有三件事不為老師所認同，除前述之事外，其二就是季氏之將伐顛與。《論語·季氏》載

季氏將伐顛。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顛與。」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顛與，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sup>56</sup>

文中，見孔子者有兩人，一是冉有，一是子路，但被孔子責備的起先只有冉有一人，這說明冉有主責，及冉有牽連出子路（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遂二人俱責（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但此事尚未付諸實行，二人又無能說服季氏，故而求

<sup>54</sup> 季氏專權由來已久，從魯襄公薨於楚宮，子野立後不久就死在季氏那裡；季武子立十九歲猶有童心的魯昭公以便控制，後昭公果因鬥雞之變逃到齊國，如晉也受到阻擾，終於死於乾侯這地方；定公十年的夾谷之會，季氏更讓國君犯險，幸賴孔子護持，始免於禍。這些事跡在《左傳》皆有記載；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第四冊（臺北：廣學社印書館印行，1975年），頁2204、2216-2219、2194皆有深入之解說，可參看。

<sup>55</sup> 元·許謙：《讀四書叢說·泰山章》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31。

<sup>56</sup> 同註4，頁169-170。

見孔子，本有報告、請教孔子之意。其後可能即以孔子的說法，說服季氏，故史未見季氏伐顓臾之記載。<sup>57</sup>由此可見據理力爭之重要，但一則冉有說理的能力終究不及孔子，二則是季氏的強勢，所以連子路在場也無能一起勸服季氏。三則也因冉有的「想太多」，他因為顧慮顓臾近於費而且堅固，公山弗擾就曾以費叛變過，<sup>58</sup>所以他才會說「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這也是他所以未堅決反對季氏的原因。換言之，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立場問題。政治本來就是妥協的產物，以理據去說服別人改變立場本即不易。故而以上「旅泰山」、「欲伐顓臾」二事，孔子雖有微言，但不能說冉有對此二事沒意見、沒努力反對過。孔子的責備，自有求全之意。

《左傳·哀公十一年》(484B.C.)又載：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sup>59</sup>

孔子此時剛因冉有之關係始得自衛國回魯，又被聘為國老，故季孫使冉有來諮詢孔子，實際上是希望獲得孔子的支持。而派冉有來，一則是因冉有為季氏宰，二則更因孔子之回魯與冉有有關。故孔子可能因此不便立即公開反對，所以說「吾不識也」，且三次發問，皆未有「公開的」回應。孔子雖於公開場合無有說明，但私下卻對冉有表達了個人的意見。但也因沒有公開的說詞，所以冉有無法說服季孫，故次年春天，即「用田賦」。<sup>60</sup>當然，這是冉有之責任，冉有為一退讓之人，或許無法完全堅持立場，但最重要的因素當是哀公十一年，與齊國發生戰爭後，因國用不足，季孫擔心大國復仇的軍隊必將很快到來，<sup>61</sup>所以他才要加重稅賦，冉有考度時勢，才會附和季孫之加賦，否則以冉有「三年可使足民」之志，<sup>62</sup>當不至此。

冉有之妥協於現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在政治現實的考量上，冉有夠不上孔子心目

<sup>57</sup>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即引氏洪曰：「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同註 4 頁 171。

<sup>58</sup> 見同註 4，頁 176。

<sup>59</sup> 同註 46，頁 1019。

<sup>60</sup> 此事經傳俱書，以其影響人民之大也。

<sup>61</sup> 《左傳·哀公十一年》載：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見同註 46，頁 1018。

<sup>62</sup> 同註 4，頁 130。

中大臣的要求，因為他回魯後未曾為理念去職，沒有做到「不可則止」的要求，也沒作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的獨善其身。<sup>63</sup>然而孔子不也在努力尋找機會，甚至還遭到子路的多次質疑嗎？最後孔子終究沒能在亂世中實現他的理想，最為其所稱讚的顏淵，也終身未見其從政。畢竟理想要落實到現實中，一定會有衝突產生，在亂世的衝突就更大。冉有的妥協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論語·雍也》載冉有對孔子說：「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蔡仁厚所說：

以冉有之才，固不應以力不足自誣也。不過，孔子之道至高至大，顏子「既竭吾才」，尚且還有「末由也已」之歎，則其高卓處，亦實有不易企及者。<sup>64</sup>

自有部分之理，但還只是表象。朱熹以為「畫者，能進而不欲」，未必定是這樣。太史公在《史記·孔子世家》寫到孔子絕食陳蔡之間，召三弟子問話，子貢就說：「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盍）少貶焉？」孔子流浪列國之間而到處碰壁，使儒者必能用於世，或許還真要如子貢所說的才行，也許子貢的話「正表出了大家的心聲」。<sup>65</sup>但這只是一部分原因，最重要的還是大環境的因素。司馬遷《史記·禮書》說得好：

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sup>66</sup>

在那樣的亂世，多少人「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相較與其他弟子，冉有能在亂世中爭得一席之地，抵擋下無數不合理的決策，總比，放手讓國家腐到底的好得太多了。而他所說的「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也要從大環境來理解才是。

當然，冉有之被責，亦非無由，他「在孔子的心目中」，嫌得太聽季氏的話了。冉有為季氏宰，既有行政能力，又能兼顧理想與現實，所以很得季氏的看重，常參與季氏之私朝。孔子對此就很以為然，《論語·子路》即載：

<sup>63</sup> 同註4，頁75。

<sup>64</sup> 同註20，頁56。

<sup>65</sup> 同註20，頁56。

<sup>66</sup> 同註1，頁1159。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sup>67</sup>

他也曾被季氏派為說客。《左傳·哀公·十四年》載：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sup>68</sup>

由引文以看出，子路此時仍在季氏手下辦事，以及子路之對信義的執著。子路推辭後，季康子派冉有作說客，冉有以「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的尊榮游說子路，但子路卻堅持理念，不做不義的幫凶，因而義正詞嚴的拒絕了冉有。而冉有妥協於現實之性格亦由此可見。但也因為如此，他才能站穩救世的腳步。只是有些事情在現實與理想的兩難下，偏離了孔子的理念。<sup>69</sup>至於子路則可能因為告訴孔子「季氏將伐顓臾」時，其位階已不如冉有，今又不願、不答應面見小邾射，以次年子路在衛罹孔悝之難，可知子路或已自行辭職，或為季氏革職，也失去繼續輔佐季氏之機會。而子路之死，也更加證明，除非退隱，否則要在亂世「為政」，要堅持高遠的理想是多麼不易的事。

冉有絕非事事聽從季氏的，他只是一個較保守，而且謹守「臣子」分際的人。在季氏招他回魯之後，他沒有鹵莽的建議季康子迎孔子回國，直到郎之戰打敗齊國之後，他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與發言權之後。因此當季康子問他：「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立即順水推舟的回答：「學之於孔子」，其實孔子是不教軍旅之事的。<sup>70</sup>季康子又問說：「孔子何如人哉？」冉有回答說：「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這種回答幾乎可與顏子之嘆、子貢護衛孔子之論相提並論了。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其後才有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之事。<sup>71</sup>

相對的，季康子是極其強勢的。孔子歸魯後，齊國的田常「弑其君簡公」，孔子告於

<sup>67</sup> 同註4，頁，144。

<sup>68</sup> 同註46，頁1031。

<sup>69</sup>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冉有說子路要之一事，即背離孔子之理念。因為陳成子弑齊簡公是國外之事，且齊為大國，非魯可敵，孔子就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今小邾射做出不臣之事，換做孔子，想必也會反對冉有的說法。但凡執政即有執政的現實考量。

<sup>70</sup> 《論語·衛靈公》載：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同註4，頁161。

<sup>71</sup> 見《史記·孔子世家》。同註1，頁1934。

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去告訴了三家，得到的答案還是「不可」，此見孔子於季氏亦無能為力。<sup>72</sup>此外，我們從《論語》中孔子與季康子的對話也可看出，孔子對季康子講話，都很有禮貌，也很客氣，他也沒有反對季康子什麼，冉有來向他問田賦，即使心中反對，他也只私下對冉有講。以孔子之國老身分，都沒對季康子講些什麼，以冉有的處境，要反對季康子，也就更顯其不容易了。

冉有既然常常退而學於孔子，必也常常勸諫季氏，他的理想，是「留在體制內進行改革」，而非「邦有道則現，邦無道則隱」，在他的努力下，擋下不知多少的不合理的施政，因此《韓詩外傳》卷十說：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因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sup>73</sup>

接著又說：

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sup>74</sup>

由韓嬰引孔子之語，推許冉有為「諤諤爭臣」之一，而與子路並論，我們可以想見他辛苦維護正義之一端，至於他常為孔子責備，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亦非事情之全貌。孔子未留在體制內，對「八佾舞於庭」這類的事情，也就只能徒呼負負了。故見錄於《論語》之背後，實多冉有口難言與苦心孤詣處。而就子貢對他的了解，他是一個「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的人，孔子也曾告訴他：「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sup>75</sup>也可謂對他訓勉有加，期許備至了。

至於孔子對他最大的責難，則是因為他幫富於周公的季氏搜括，孔子直欲將冉有逐出門牆，而霹靂相責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sup>76</sup>再怎麼樣，相關典籍中，從未見孔子對學生有過如此嚴厲的責備，蓋為季氏之搜括，不僅使全民的負擔加重，也背

<sup>72</sup> 見《論語·憲問》（同註4，頁154-155）及《史記·魯周公世家》（同註1，頁1545）。

<sup>73</sup> 同註41，頁353。

<sup>74</sup> 同註41，頁353-354。

<sup>75</sup> 并見《孔子家語·弟子行》，同註3，頁27。

<sup>76</sup> 同註4，頁126。

離冉有自己「三年可使足民」的政治理念。子路在時，冉有還能與子路共同阻擋季氏之所欲，子路去魯之衛，以冉有之謙退性格，「單獨」對抗季氏的強勢與無理的要求，就更加辛苦了。<sup>77</sup>孔子之怒責冉有，有可能是作給季氏看，因為冉有聰明和樂，孔子這樣作，冉有可以明白，也可吞忍，但此事絕不能說破，其後記錄《論語》者，或因不察孔子之真意，或欲讓後學記取教訓，遂使責冉之語，流傳千古，而冉子之揆負罵名，「或亦」有冤。自孔子死後至哀公二十七年，《左傳》與《史記》等相關典籍都未記載哀公與季氏的衝突，可見他們至少維持了十餘年的和平關係，哀公沒有受到季氏的更大脅迫，這與冉有之當政應該也有所關聯。<sup>78</sup>

先是子貢仕於衛，魯哀公二十七年(468B.C.)春天，季康子將召子貢回魯，此時冉有可能將死、已死、已離職或因反對康子而不再受到重用或因季康子病危。總之，冉有很可能無法再參與季氏與魯國之政，此由四月季康子死，魯哀公與三桓關係立刻陷入緊張可知。八月，三桓攻哀公，哀公奔衛。如果孔子對冉有的評價「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無誤，則冉有必不參與此事或已離職，其後史無明文，冉有之行止無得而究，但三桓益勝，魯亦「卑如小侯」了。

總之，至少在魯哀公三年至魯哀公二十三年，甚或至二十七年的這段時間中，魯國的政治以季康子為中心，而冉有為季氏之宰。值世道衰微，時局巨變之際，他外抗強敵，內諫強主，對比襄公之後的魯君受制權臣，他的施政竟能穩定魯國君臣關係，外交吳宋，保境安民，二十餘年間，除增賦一事外，國家無故，魯君賴安，冉有之功也。謂之「國之柱石」，不亦可乎？

## 五、冉有護國之勇略

冉有雖嘗為孔子所責，但孔子早知冉有之能，《禮記·檀弓》記載有子回答曾子的話中曾提到孔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sup>79</sup>孔子失魯司寇在魯定公十二年(498B.C.)，次年(497B.C.)離開魯國，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時年三十四歲。孔子離開魯國前，曾欲「乘桴浮於海」，亦即想去海外；也曾想去邊陲窮荒之地，所謂「子

<sup>77</sup> 朱熹嘗言：「冉求之病，乃是子路底藥；子路底病，乃是冉求底藥。」同註 11，卷 40，頁 1069。二人互補，還未能力抗季康子之多欲，何況子路離開之後，冉有就更辛苦了。

<sup>78</sup> 魯哀公二十三年(472B.C.)，春，宋景公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時冉有五十歲，猶當政。

<sup>79</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李學勤主編標點本《十三經注疏》重刊宋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 267。

欲居九夷」，所以他想先遣冉有打點安排是有可能的。這是因為冉有曾在魯國有過行政經驗，而且冉有亦當有披荊斬棘，不畏艱困的開創性格，孔子離開魯國時，冉有也放棄仕途，追隨孔子流浪異邦，光就這一點，就可見冉有的勇敢。否則孔子不可能付之以重任。周流列國的途中，季康子亦不可能「召之」的。凡此皆可見冉有之能耐。他撐持起魯國之一片天，故稱之為「魯國之柱」，以下述其抗齊護國，使魯屹立不搖，故謂為「魯國之石」。

魯哀公十一年，春天，因為去年吳、魯會於郟，攻齊南郡之故，齊之國書、高無丕帥師伐魯，到達清這個地方。季孫對冉有說：「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冉有前後提出三策：第一策是「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但季孫自思不可能說服孟孫氏與叔孫氏跟隨魯君在國家的邊界對抗齊師，因此否決說：「不能。」於是冉有提出了第二策：「居封疆之間」，在國境之內對抗齊師，季孫認為可行，就告訴叔孫氏跟孟孫氏，但不為兩家接受。冉有於是提出第三策：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sup>80</sup>

由此可見，冉有在軍事方面是有戰略思考頭腦的。他在面對上司的時候，或許無法使季康子之行事完全合於正道，而被誤認為過分的聽話，但一旦面對國家之死生存亡，他不但有想法，口才也能激勵季氏，而且表現出他真正的勇敢。

這場戰爭驚險萬分。首先就兵員而言，「季氏之甲」大約有七千人編成左師，由冉有帥領；冉有又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其餘「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sup>81</sup>雩門依杜注是南城門，國家的主力部隊，也不過數千人，所以老幼都分派去守宮城後方，顯見已有最壞的打算。孟孫、叔孫又無戰意，孟懿子的兒子孟洩所帥的右師，五日之後才「從之」。而《左傳》記載連貴為魯哀公叔父之務人及年僅十四歲的童子汪錡也上了戰場，而且最後都陣亡了。此役就地點言，《禮記·檀弓》載「戰於郎」。郎在今山東魚台，距魯都城僅九十里之遙。<sup>82</sup>可見齊軍已深入魯境。因此這場戰爭情勢之危急可知。而且當時「齊師自稷曲」，但「魯師不踰溝」。最後依樊遲的建議，三次申明戒令，並由冉有帶頭先越過壕

<sup>80</sup> 同註 46，頁 1016。

<sup>81</sup> 同註 46，頁 1016。

<sup>82</sup> 程發軔先生：《春秋要領》（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頁 132。

溝，而且由於冉有瞭解敵軍的長短，全軍「用矛」，才能「師入齊師」，獲得最後的勝利，孔子也對此事大加讚賞。<sup>83</sup>由此看來，冉有在軍事上，是既有勇氣，也有謀略的。

以「生死」而論，《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載：子路曾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道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sup>84</sup>因此如果此次戰敗，依照孔子的意思，冉有是要自殺的。冉有有勇有謀，「事國能致其身」，謂之「國之柱石」，不亦可乎！

## 六、結論

由以上之論述可知，冉有雖無顯赫之身世，但他多能多藝，既從學於孔子，又在孔子任職魯國其間協助孔子，行政能力素為季氏所重。就其質性風姿言，從〈侍坐章〉，可以看出他不說大話，遇事謹慎保守，不尚浮誇之性格。從孔子答冉有問「聞斯行諸」章，可見其謙退之資性。但他也能在前途一片大好之時，捨棄功名利祿，跟隨孔子周流列國，為冉子請粟時也有自己的主張。說他奴性不改，實在厚誣先哲。他與朋友相處融洽，活潑和樂，所謂侃侃如也，而與於子貢氣質相近。他的向仁之行，行仁之志，在同學心目中，足可與子路等量齊觀。他為公西華請粟之舉，雖是錦上添花，可見他對同學的疼惜；伯高之死，他為老師「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雖屬自作主張，可見他對老師的愛護。他多能多藝，對射御書數、理民治賦、領軍作戰，都頗在行，好學好問，知識廣博，可謂文武全材，除禮樂外，幾已達成人之境。

此外，春秋末期魯國君臣關係不佳，大夫陵駕公侯，國君地位低下，季氏故意立年十九猶有童心的昭公，以便掌控，又使定公涉險夾谷之會，這些都顯示魯君的危亡之勢，最後連孔子亦被逼離魯國，而八佾舞於季氏之庭。冉有被召回魯之後，作為權臣的家宰，孤軍奮戰，無能阻季氏之旅泰山，孔子亦未深究，就算有子路之協助，亦幾乎無法阻季氏之將伐顯與，可見當時情勢之危峻與堅持理想之難能。孔子周流列國，即使因某種妥協而遭子路之懷疑，也終究沒能在亂世中實現他的理想；顏回終身不仕，自不會與現實有所衝突。而冉有身處亂世，勇敢承擔一切，既阻擋了季氏多數不合理的決策，更能率軍戰勝齊師，保住風雨飄搖的國家。在舉世「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或「袖手亡國」之際，他不但

<sup>83</sup> 《左傳·哀公十一年》云：「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同註 46，頁 1017。

<sup>84</sup> 同註 3，頁 105。此事《禮記·檀弓》亦載。

能內諫強主，外抗強敵，對比襄公之後的魯君受制權臣，他能審時度勢，平衡理想與現實，穩定魯國君臣關係，外交吳宋等鄰國，在他當政的二十幾年間，除增賦一事之外，國家無事，魯君賴安，稱之為「國之柱石」，該可算是「實至名歸」了。

## 徵引文獻

### 古籍

- \* 漢·司馬遷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
- 漢·鄭玄著，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李學勤主編標點本《十三經注疏》重刊宋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周禮注疏》（李學勤主編標點本《十三經注疏》重刊宋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 晉·王肅注：《孔子家語》（臺北：世界書局，1966年）。
- \* 宋·朱熹集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
- 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元·許謙：《讀四書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 清·阮元校刊：《十三經注疏·左傳》（重刊宋本左傳注疏附校刊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
- 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 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年）。

### 近人論著

- 王漢蘇：〈孔門十哲生平述要〉，《育達學報》第2卷（1988年12月），頁40-49。
- 朱守亮：《論語中的四科十子》（臺北：萬卷樓，2006年）。
- 李滌生：《荀子集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
- 修建軍：《孔門弟子》（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
- 高專誠：《孔子·孔子弟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 \* 許維通：《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
- 舒大清：〈孔子弟子冉有論〉，《湖北社會科學》第5期（2006年5月），頁113-115。
- 程發軔：《春秋要領》（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
- 傅佩榮：《孔門十弟子》（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年）。
- \* 趙善詒：《說苑疏證》（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85年）。

\*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蔡仁厚：《孔門弟子志行考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日）諸橋轍次著，千祥譯述：〈論語弟子考(11)--冉有〉，《孔孟月刊》第2卷第11期（1964年7月），頁24+9。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ai, Ren-hou. *Confucian disciple ideal study*. Taipei: Taiw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 Gu, Dong-gao . *Chun qiu event table*. Taipei: Kuing xue society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 Hanfeizi. & Chen, Qi-yau. *Hanfeizi New Annotation*. Taipei: Han Jing cultural undertakings, Ltd., 1983.
- Lie, zi. & Yang, Bo-jun. *Liezi annotat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
- Liu, Xiang. & Zhao, Shan-yi. *Shuo Yuan Shu Zhg*. Senhangh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1985.
- Ruan, Yuan revise. *Shi san jing zhu shu - Zuozhuan*.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 Sima, Qian. & Yang, Jia-luo Ed.. *New Book Proofreading Three notes Records*. Taipei: Ding Wen Book Company, 1991.
- Wang, Su. *Kong Zi Jia Yu*. Taipei: She Chieh Book Company, 1966.
- Xu, Wei-jue. *Han Shi Wai Zhuan Annota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Zhu, Xi . *Four Books Annotationao* . Taipei : Da an Book Company, 1987.

## The New Discussion on Ran-you (冉有)

Liou, Guo-ping

( Received March 31, 2014 ; Accepted September 28, 2014 )

### Abstract

Although Ran-you is the ten famous students of Confucius, and versatile, but also suffer the most blamed by Confuciu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 study only f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an not highlight the historical evalu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Ranyou from the others. Therefore re-examine, hoping to clarify issu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an-you not only have administrative skills, but also very good o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roubled times, he stayed within the system to reform. block off many unreasonable policy of Chi Family, showing the integrity of statesman. He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a troubled world. Not only overcome the invasion of Qi, but also to maintain domestic political stability. Over ten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Confucius, he makes Lu stability., it can be called “the pillar of Lu.”

Keywords: Ran-you(冉有), Political skills, Lu(魯), Chi Family(季氏), The pillar of the country